

鲁迅与1920—30年代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

——在与同时代日本·西欧的关系之背景下——

白井澄世（东京大学博士生）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始创期，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翻译介绍为时较晚，也似乎不太引人注目。比如，最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翻译出版为1926年，最初的选集刊行要等到1946年（~1953年，文光书店）。但在同属亚洲的日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一直拥有众多的读者。自1892年内田鲁庵译《罪与罚》，1917年的16卷全集出版以来，至今共发行的全集达11种之多。和日本的这种「狂热」相比，现代中国，特别是民国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获得广泛的读者，显得冷清多了。¹⁾关于中国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疏远」，人们常常引用鲁迅的话来描述。²⁾

他（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太伟大了，而自己却没有很细心的读过他的作品。回想起来，在年青时候，读了伟大的文学作品，虽然敬服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但丁，[略]还有一个，就是陀思妥夫斯基。[略]这陀思妥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可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决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因为伟大的缘故。但我自己，却常常想废书不观。不过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却还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³⁾

但是，鲁迅并不是认为中国不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自己，也并非对陀氏完全没有兴趣。他在很多文章中言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能看到其作品的翻译。而事实上，中国最初的翻译，也正是因鲁迅的推动而实现。因此也不妨可以说，上引鲁迅的话，其实是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抱有强烈兴趣的一种表现。

另一方面，在鲁迅作出上述发言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疏远」状态似乎有所改观。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50周年的1931年，《罪与罚》、《被侮辱与损害的》、《地下室手记》等主要作品被翻译出版外，日本、苏联的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也被大量翻译介绍。作品的翻译，加之外国评论的介绍，可以说1930年代逐渐形成了一种重新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土壤。而鲁迅的文章正发表于这一

时期。

关于此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状况，较为完整的研究应数李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三十年代的中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4期）。李今认为，与20年代不同，在30~40年代的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得到了肯定，但即使如此，中国知识分子还是「缺乏感同身受的共鸣和掩饰不住的赞赏」。他在说明中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非亲和性时，引用了鲁迅的文章。

但如前所述，中国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正式开端(作品的翻译)是鲁迅。10年后鲁迅文章的用意，是否真的在于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的非亲和性？鲁迅的文章，是在怎样的状况下写的？应该如何解释？但是，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言及很少而且极为慎重，很难探寻其真意所在。因此，本文试图以鲁迅为中心整理中国20-3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翻译介绍情况，同时确认鲁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探讨其文章的真意。为此，本文将弄清3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的日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的具体情况（李今等中国研究者虽有指出但未作分析），作资料性的补充，并对日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状况作初步考察。

一 在五四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据《鲁迅目睹书目》⁴⁾可以知道，鲁迅在1913年8月8日读到了内田鲁庵译《罪与罚》（东京：丸善株式会社，1913年），1917年看到中村白叶译《罪与罚》（东京：新潮社，1917）和片山伸译《死人之家》（东京：博文馆，1914年）。1917年接触到的两本书，记载于同居中的周作人的日记。⁵⁾此外周作人还于1917年9月3日，阅读了从丸善书店订购的「J. C. Hogarth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集》」。这是当时在日本非常流行的Everyman's Library (J. M. Dent & Sons LTD) 的J. C. Hogarth英译版《Letters from the underworld, The Gentle maiden, The Landlady》(1913)。同年9月7日，周作人购入《North American review》717号，读到上面英国人Trites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Dostoevsky〉，并记有笔记。

周作人似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有感触，将Trites的文章翻译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上。这是中国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早的论文之一。Trites的评论简单而言就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描写潜藏于“卑微之人”中的“人类共通的感情”的人类主义、人道主义作家。周作人基本上沿袭Trites的评论，并一边

阐述自己的意见。他在这篇文章的附记中，感叹目前还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罪与罚》的中译本，并表示有意翻译(终未实现)。此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屡次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俄国「人道主义作家」进行介绍。另一方面，与周作人相反，当时共同生活、共同立志于新文学的鲁迅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保持了沉默。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的1921年，除周作人外，茅盾和郑振铎也都发表了文章。1921年11月，《文学旬刊》19号编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特辑，茅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带了些什么东西给俄国？》这篇文章中，追问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在俄罗斯的效用，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已带了特别的礼物给俄国的平民，俄国的知识阶级了”，“这东西〔略〕就是人性的永久真实”，“他把那些「被践踏者与被损害者」自身的纯洁的内心生活坦布出来指给他们看，叫他们知道人性的永久真实的伟大的力量”。此后，茅盾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月报》第13卷第1号、1922）中阐述了整体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观。在其文中可看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俄罗斯和欧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的影响。比如Merejkowski的“Tolstoi as man and artist”(G.P. Putnam's Sons,1902)、Janko Lavrin的“Dostoevsky and his creation : a psycho critical study”(W. Collins,1920)、J.M.Marry的“Fyodor Dostoevsky : a critical study”(Martin Secker,1916)。这些文献很多受到1900年前后俄罗斯象征主义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作为灵的存在加以刻画的独特思想和哲学）的影响，与当时出现于俄罗斯的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相对立。茅盾一面参考这些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多角度的探讨，在此基础上论述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是“人类伟大的思想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另一方面，郑振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介绍基本沿袭克鲁泡特金的观点。他说“他是使我们爱，使我们哭的传道者”，“在俄国的作家中，最富平民精神，博爱思想，人道主义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爱人类的心肠，实是广莫无边的”，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确定义为“人道主义作家”。⁶⁾

他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因其文学观的不同而各异，但在“人道主义作家”这一点上是共通的。如此，人道主义作家这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就因新文学运动的三位主将的介绍而基本成立。⁷⁾此形象以五四时期思想和文学的主题为背景而形成，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期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坚固的框架。⁸⁾比如在1920年被翻译成中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冷眼（圣诞树和婚礼）》（《东方杂志》第17卷第11号、1920年）

的〈记者志〉就明确地写道：“他的文学，人道主义的色彩最鲜明。”

此人道主义作家形象先行的原因之一，也可归结到介绍先于翻译这一情况。当时翻译成中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只有〈冷眼〉和乔辛焘所译的《贼》（《民国日报》1920年26~29日）两篇。也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几乎未被阅读的情况下，“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这一形象就独自先行。鲁迅对此现状表示忧虑，希望尽早刊行翻译，因而当时一直保持沉默。

二 鲁迅与未名社

1924年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友会的演讲中，对文坛的现状表示不满，主张必须培养民众的土壤，批判排斥外国思想的风潮，并说到：“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基的名字，已经厌听了”，但是他们的作品大多还未翻译，必须学习引进外国作品的技巧和思想（〈未有天才之前〉⁹⁾）。中国最初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翻译，就是经由旁听演讲深受感动，仰慕鲁迅而加入青年文学团体“未名社”的一位作家之手¹⁰⁾——韦丛芜翻译的《穷人》（1926）。

鲁迅在给《穷人》的《序》中，称赞其翻译“弥补了些缺憾”，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类灵魂的伟大检查官，是高度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这部小说描写了贫穷的病人们。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和作品，表示“本是一时钻研不尽的，统论全般，决非我的能力所及”，谨慎地避开了特定的解释。¹¹⁾

鲁迅的态度是谨慎的，不从笼统的印象解释一个作家，而是要先将作品本身提供给读者。这种谨慎，在未名社作家之间，包括译者韦丛芜（1905~78），都是共通的。未名社是1925年成立于北京的文学团体，以安徽省出身的青年韦素园、其弟韦丛芜、台静农、李霁野、曹靖华等人¹²⁾为中心。因韦素园、曹靖华曾加入共产党且留学苏联，他们的文学活动主要以介绍和翻译俄国·苏联文学为中心。韦素园（1902~32）、曹靖华（1897~1987）均于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

虽然未名社作家们都是深受俄国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的青年，却并不过于主张“思想”“主义”，而是从事一些踏实的翻译工作。韦丛芜先翻译了〈阿列伊〉（《死人之家》中《最初的印象》的一部，1925年发表于《莽原》第2期），其后出版了《穷人》。《穷人》以Constance Garnett的英译本《Poor People》¹³⁾为底本，先由韦丛芜翻译，然后鲁迅对照原久一郎的日译本进行修改，最终由韦素园与俄语原文对比校正而完成。中译

本里，除鲁迅的《序》以外，还收录了底本中Thomas Seltzer的解说的中文翻译。Thomas Seltzer为美国的俄国现代文学翻译家兼编辑，负责《Modern Library》系列中俄国现代文学的编辑与解说。五四时期，很多中国作家(比如茅盾、郑振铎等)都通过《Modern Library》系列接触外国文学，在接受俄国现代文学方面，受Thomas Seltzer的影响很大。¹⁴⁾Thomas Seltzer认为描写穷人的俄国文学里有一种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精神。在《Poor People》的解说中，他也基本持此观点分析作品，并简短地介绍了作家的生平和思想。韦丛芜对此解说没作任何附言，可以推想他是基本持同调于Thomas Seltzer的观点来进行翻译的。

而且，韦丛芜于1931年以Garnett英译本为底本翻译出版了《罪与罚》。《罪与罚》的发行广告引用了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的日本文学者本间久雄的文章——他“生动而写实地描写了下层社会的真实状况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对此状况和下层社会的人们表现了人道主义的心情”¹⁵⁾。因此可以说，韦丛芜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与作家的人道主义者形象一起传达给读者们的。¹⁶⁾韦丛芜的翻译，没有脱离五四时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的框架，其翻译本身为五四新文学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是，将韦丛芜的翻译和俄语原文进行校正的韦素园，却提供了一个与五四时期不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他在《罪与罚》的〈写在书后〉中引用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的文献，论述了一个崭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他引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家罗加切夫斯基(rogachevski)的《最新俄国文学》(1923)。罗加切夫斯基是初期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他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定义为城市资产阶级新兴文学的开拓者、“城市的艺术家”，认为其作品从主题到全体都是城市生活的反映。他在《最新俄国文学》中，通过阶级分析将陀氏定位于“小资产阶级艺术的天才”。¹⁷⁾韦素园还介绍了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的革命的“新时代的预言者”这一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¹⁸⁾强调了陀氏作品有培育“时代生活革新的动力”也即“反抗的精神”的效果。

韦素园引用的罗加切夫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都是20年代苏维埃的比较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见解。特别是卢那察尔斯基的观点，是1921年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时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评论。但是，20年代末以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批评逐渐倾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面否定。

而在中国，卢那察尔斯基等马克思主义文学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却并没

有变质，而是突破了五四时期的人道主义形象的框架，作为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被传播接受。导致这一现象的背景，在于30年代的中国继续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翻译，而且引进介绍了大量的外国评论。可以说，韦素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为脱离20年代的人道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进入接受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的时代起到了“架桥”的作用。

在执笔〈写在书后〉的1931年6月，韦素园因肺结核濒临死亡。据说他在病房的墙上贴着“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的大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画像。¹⁹留学革命不久后的俄国，却独自死于病房的韦素园，应该说凝视到了与人道主义作家不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1932年，韦素园病逝，其弟韦丛芜继续翻译了《死人之家》（正中书局，1947）、《卡拉玛卓夫兄弟》（文光书房，1953），未名社同人李斋野也翻译出版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三 瞿秋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观

在此，作为1920年代左翼文学者的一例，将对瞿秋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观进行探讨。如果说韦素园在1920年代未吸收了苏维埃的优秀马克思主义批评，为30年代中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作的肯定性接受奠定了基础，那么瞿秋白则为中国带来了19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中最新的否定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瞿秋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与韦素园的论点形成对照，影响了中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下面进入具体论述。

瞿秋白于1917年进入俄文专修馆，五四时期作为学生领袖开始参与社会活动。他开始对托尔斯泰式的劳动主义和基于爱的理想社会抱有幻想，最终为探寻理想社会的实现方法而对“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第二年秋天以《晨报》记者的身份奔赴苏俄。

在1919年末到1920年的整个思想界的思想分化中，瞿秋白抱着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试图通过俄国文学来摸索解决方法。他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中说到，俄国的现状很多与中国相似，有必要介绍俄国文学。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者只是社会的代言人，这正是瞿秋白最基本的文学观。基于此文学观，他在滞留俄国期间（1921~22），努力通过俄国文学来把握俄国社会的变动和思想的变化。执笔于此间的《俄国文学史》正是一部通过作家的思想和作品来描写1905年革命以前的19世纪俄国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著作。其基本内容为：从普希金开始的19世纪的贵族知识分子是突出于一般凡庸大

众的存在，但1861年的农奴解放前后，出现了屠格涅夫描写的只会空谈理想的「多余的人」知识分子形象。而到70年代，在贵族阶级崩溃的过程中，一方面出现了宣扬自身对平民欠债的旧贵族（“到民间去”），一方面也因经济变动出现了一批新兴的资产阶级“市侩”。濒于消亡的贵族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相冲突，其中更有无产阶级文化的勃兴，在此新旧交替之际出现的就是“遁入古俄浑朴之乡”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²⁰⁾

瞿秋白认为二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的文学“反映了当代俄国社会之‘沉痛的心灵’”，但这是在阶级斗争中的兴起的一种小市民阶级的精神。瞿秋白更进一步说：“清高的贵族的社会地位一天一天的崩溃，成了普通的雇员，如何受得了那酒肉熏天的市侩气，农村制度日益受城市商业的恶影响，更须要求精神上的维繁——然而一盘散沙的，小农小工，那里有去恶的伟力，只能认识认识自己的‘善’，当作安慰，当作抗议罢了。”可见瞿秋白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置于贵族阶级、新兴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之中，认为二者的文学是在三个阶级的争斗中出现的小资产阶级的逃避精神的反映。这是瞿秋白从阶级观念对二者的评价。

此后资产阶级横行的80~90年代，便有反抗“市侩主义”的斗士高尔基的出现。瞿秋白总结道：高尔基描写了成为1905年革命预兆的无产阶级，承担了为他们倡导“反市侩主义”的社会使命。

当时的瞿秋白认为，在现实的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日益没落，凭借西欧资本而抬头的新兴资产阶级也即中国的“市侩”正处于支配地位，因此他从俄国的历史预感到中国“革命”的到来。而且他认为高尔基正体现了“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所应肩负的使命，所以他决心成为一个革命家。²¹⁾但瞿秋白对高尔基的推崇，同时意味着他在理论上将五四时期的理想作家托尔斯泰断定为过去的知识分子，也使他失去了更多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契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农奴制瓦解资本主义抬头时代描写城市小市民精神的天才作家——这是佩雷威尔捷夫（Pereverzev）的定义。瞿秋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与之酷似。佩雷威尔捷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1922）出版于瞿秋白滞留俄国期间的莫斯科，他有可能过目。更重要的是，近似佩雷威尔捷夫理论的瞿秋白《俄国文学史》于1927年在中国出版，²²⁾给文学青年极大的影响。这本书似乎告诫着：憧憬俄国革命的青年们应该学习的榜样，不是托尔斯泰，也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高尔基。

但是，瞿秋白并不是完全无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认为他是一个擅长描写人的心理的作家。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1928年，瞿秋白取代陈独秀，实质上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当时有一个年轻人，携带俄人托付的五千元党费，在路上被抢动，因无脸见瞿秋白，留下未婚妻行踪不明。(后来知道此人是携带而逃。)据说当时瞿秋白说：“这钱要害了那孩子一生一世的。朵斯退也夫斯基小说里有类似的事情，那个犯罪的人一生受良心谴责……。”²³⁾可见，对有丰富的文学才能，却立志选择从事社会运动的革命家之路的瞿秋白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仅是一个作为小资产阶级应该被否定的作家，只是瞿秋白自身所肩负的时代的使命不允许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思想的课题来钻研。

由此可见，在当时中国的现状之下，虽然深切关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但却无法将它作为自己的思想、时代性的思想予以接纳。可以说，瞿秋白的否定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正体现了当时中国的这种政治思想状况。这与下一节将论述的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有着共通之处。瞿秋白在1930年代与鲁迅结下深厚情谊，鲁迅将瞿秋白视作自己最好的朋友之一，而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则暗示出两人对于时代的共通认识。

四 30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日本“文艺复兴”的影响

如以上所述，到1920年代末，已为摆脱五四时期的“人道主义形象”、引进包括肯定、否定等多种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好了准备。一进入3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译相继问世。1930年代初期，除韦丛芜译《罪与罚》、李霁野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以外，洪灵菲译《地下室手记》(商务印书馆，1931)和《赌徒》(湖风书店，1933)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品也陆续翻译出版。自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的传播接受进入百花齐放的发展阶段。

例如，外国的研究成果也被介绍过来，比如以精神分析为理论依据的亚鲁沫林斯基(Yarmolinsky)的最新论著《Dostoevsky : A Life》(1934)(《文学》第4卷第1号，1934)、云林译·卢那察尔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春光》第1卷第2期)、斐琴译·纪德(Gide)《关于妥斯退益夫斯基(朵思退益夫斯基百年祭时于乌优哥伦比亚艺术座的小演说)》(《东流》第1卷第3·4期)、沈起予译·安德列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质》(升曙梦《陀思妥耶夫斯基再观》所收)。²⁴⁾这些文章，从卢那察尔斯基到纪德，都是20~30年代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在这一同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大量引进的现象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时日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被大量介绍到中国。特别是1934~35年，受日本文坛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的波及，各种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被介绍到中国。

比如，《文学》第3卷第1号(1934年7月)的栏外，刊登了日本升曙梦的《综合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再观》(Nauka社，1934)的出版消息。该书正如其副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照耀下”所示，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罗加切夫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到继承地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性的佩雷威尔捷夫，综合地收录了1910~20年代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成果。此外，东京左联的机关报《东流》创刊号(1934年8月)刊载了曼之译·除村吉太郎著〈从果戈理到托尔斯泰〉(原载《浪漫古典》第1辑，1934)、莫孚译·冈泽秀虎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方法〉(原载《文艺》第2卷第4号，1934)等文章；第1卷3·4号刊载了魏晋译·米川正夫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学中的位置〉(原载《书物》特辑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1934)一文。

这里提到的杂志《浪漫古典》以及《书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专号，是在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日本文学新浪潮的影响下刊行的，其内容千差万别，既有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否定评价，也有超越各种立场的作品研究、传记研究等。

当时的日本，伴随因左翼运动受镇压而导致的普罗文学运动的衰退，兴起了“文艺复兴”的风潮。所谓“文艺复兴”，是指曾经统治文坛的普罗文学运动结束之后，获得解放的艺术至上主义和原先的文坛作家们开始谋求自由的“文艺”。另一方面，“文艺复兴”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因普罗文学和左翼运动的挫折而感到不安的精神。挫折、“转向”，从而陷入认同危机的左翼作家们在陷入不安精神状态的同时，也在摸索对被解体的“我”进行再建构的文体。也就是说，普罗文学的衰退使日本近代文学一贯的主题、即“我”(自我意识)这一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在日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明治时期以来都被作为描写“我”这一自我意识的文体，在同日本私小说的关联中被阅读。而普罗文学的终息导致“我”的挫折，使作家们再次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蜂拥而至。因此在日本，书写关于自我意识的对话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重新被阅读，其思想也成为研究的对象。²⁵⁾

这时，受舍斯托夫(Shestov)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由小林秀雄提出的“不安的传道师”这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大为流行，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相反的论说，各种各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热闹非凡。将众说汇聚一堂，最能象征“文艺复兴”的杂志是《书物》和《浪漫古典》。在这股陀思妥耶夫斯基热之中，1934年日本三笠书房刊行了陀思妥耶夫

斯基全集。以上这些30年代中期在日本突然风行的各种陀思妥耶夫斯基论，都被介绍到同时代的中国。

可见，30年代中期，伴随多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译出版，百花齐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也被介绍到中国，这些评论既包括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陀氏的否定，也有日本和欧洲的俄国文学家们的各种作品论和作家论。至此，在中国读者的面前，终于出现了可以自由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块比较完整的地平。

但是，这些丰富多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的引进并非经过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取舍”。同时代的日本之所以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热，是因为普罗文学终息引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读。而在西欧，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背后有着对前卫表现方式的追求，比如以“纯粹小说”为理想的纪德对新文体的摸索。另一方面，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否定则是在1930年代达到全盛。

然而在中国，对同时代各种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的接受视野中，不见中国独自的思想选择，也不见任何受到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的思想背景影响的痕迹。例如1931年，赵影深在《杜思退益夫斯基与新俄》中，介绍了苏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判，但这则报道没有影响力，也未出现中国作家关于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²⁶⁾换言之，1930年代中国出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的热现象，是在中译本的刊行和当时世界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的带动下，大量引进各种各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而并非由中国的时代性思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进行“选择取舍”并加以探讨。

在此背景下，鲁迅才写下《陀思妥夫斯基的事》。现再此引用如下：

他太伟大了，而自己却没有很细心的读过他的作品。回想起来，在年青时候，读了伟大的文学作品，虽然敬服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但丁，[略]还有一个，就是陀思妥夫斯基。[略]这陀思妥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可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决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因为伟大的缘故。但我自己，却常常想废书不观。不过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却还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²⁷⁾

这篇文章是鲁迅于1934年购买三笠书房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时，应三笠书

房的委托为该全集写的广告。在中国，1936年2月刊登于《青年界》第9卷第2期和《海燕》第2期，《东流》第2卷第3期也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题登载。

这篇文章是鲁迅为日本读者所写的，写作时是否考虑到中国读者尚不清楚。但鲁迅作为文坛领袖，其话语的影响应当很大。此后，在30年代的中国，基本再看不到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翻译介绍了。其原因，可推想一是第二年抗日战争的勃发以及抗战文学的兴起导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冷落，再者，日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的衰退（1937年）也有一些影响吧。但也可以说鲁迅文章的影响很大。也就是说，3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翻译介绍的小小盛况，以鲁迅的文章而终止。中国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的展开，要待中国现代文学最为丰饶的40年代。

四 结语

上文论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30年代的接受状况的变化，最后，我想思考鲁迅在其中的意义。

首先，20、30年代、(1)多种作品被翻译出版；(2)苏联2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以及同时代日本“文艺复兴”下的各种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被介绍到中国。基于此二点，可以推论，对中国读者来说，(1)五四时期的人道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有所改变；(2)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自由解释的土壤得以形成。但是，即使如此，仍如李今所说，“从五四时期到三四十年代对陀氏的评论大体上由一般性的介绍生平、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进入到具体作品的评论，但大都流于生平简介和故事梗概的综述，面对陀氏强大、复杂而独特的艺术世界，中国评论界显得隔膜而疏远，缺乏置喙的功力”。²⁸⁾在中国文坛上，很难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作为思想课题来阅读论述的。对韦素园和瞿秋白来说，暴露人性和心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成为了他们个人的精神食粮，但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来看，全面而深刻地理解陀氏文学所需的接受主体方面的条件，似乎还没有成熟。

在此状况下，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和言论显现出特殊性。虽然鲁迅总是与同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状况保持一定距离，但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的接受作出了重大贡献。当20年代还未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译本时，尽力促成中译本的出版；30年代当时世界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大量涌入中国时，作为一名中国读者阐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中国的意义。

这里强调的是，鲁迅并非“代表”中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而是说鲁迅虽然对陀

陀思妥耶夫斯基抱着强烈的关心，但他鉴于当时中国的文学状况，因而采取了这种自身的思想态度。可以说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疏远”的发言就是针对此种现状吧。特别是左联虽然于30年代初期成立，却因国民党的言论统制和镇压而导致内部分裂，濒临解体。此时的鲁迅在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1933)的序中这样写到：

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介绍者合流。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介涅夫、契柯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也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凡这些，离无产者文学本来还很远，所以凡所介绍的作品，……也不过是一点挣扎。(1932年9月9日笔)²⁹⁾

中国的现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作为文学家，首先被要求的就是斗争与反抗。鲁迅自身站在传统的阵营而抵抗传统的黑暗，渴望青年们开拓新的道路。但这条新路仍旧是不容忍“忍从”的。也就是说，30年代的中国实情还不允许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的耽溺。从1910年代到30年代，鲁迅一直关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也深明不能耽溺陀氏世界的中国的现状，正因此葛藤，他才写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一文。所以，鲁迅的文章，并不代表1930年代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而是站在阅读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面发出的令人思索的声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文坛经过一度的中断，到40年代才出现真正的盛况。就此有机会别稿再论。

1)关于民国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翻译介绍的迟缓及其影响，很多研究者都有论及。李春林·杜秀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卷第3期，1990年。陈健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国苏俄文学研究史论》，重庆出版社，2007年。王聖思〈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俄国文学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2)王聖思认为鲁迅的话分析了中国读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间的「心理距离」。〈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2期。

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文艺》1936年2月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 事》，《鲁迅全集》6，且介亭杂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以下同），第411—412页。
- 4)中島长文编，东京，1986年。
- 5)《周作人日记》上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692-693页、第719-720页。
- 6)茅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月报》第13卷第1期，1922年1月。郑振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百年纪念〉，《文学旬刊》19号，1921年11月。
- 7)喬辛煥譯〈賊·譯者志〉，《民国日报·覺悟》1920年5月26日登載。
- 8)丁世鑫〈「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中国的基本定位〉，《俄罗斯文艺》200期。
- 9)〈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1，第166-170页。
- 10)李斋野〈从未名社谈到〈未名小集〉〉，《鲁迅研究文丛》第1期，1980年3月。
- 11)〈小引〉，《穷人》，开明书店，1926年6月。
- 12)参照下村作次郎〈关于〈奔原〉这个小杂志〉，《啾呀》第10期，1978年。
- 13)“Poor People”, introduction by Thomas Seltzer, Boni & Live right Inc, 1918年以前。
- 14)参照芦田肇〈初期茅盾的原理文学观的获得契机——关于其俄国文学的接受〉，《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01册，1986年。此外，郑振铎在五四时期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人道主义作论时，参照Thomas Seltzer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百年纪念〉，《文学旬刊》19号，1921年。
- 15)本间久雄《欧现文艺思潮概论》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27年，第346页。
- 16)韦丛芜译《罪与罚》（开明书店，1931年）封底的广告。
- 17)黑田辰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书物》第2年第6册，1934年，第113页。
- 18)韦丛芜在参考文献中列有路路那察尔的《革命的剪影》，这应是《文学的剪影》之误。
- 19)〈憶韦素园君〉，《鲁迅全集》6，第64页。
- 20)《瞿秋白文集》文学编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94页。
- 21)关于瞿秋白在俄国的思想转变，参看拙论〈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之“市俗”观——以与高尔基之关系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1期）。
- 22)与蒋光慈的著作合并为《俄罗斯文学》，于1927年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 23)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卷，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66

页。

24)《春光》《东流》为东京左联的机关报，翻译文章非译自原典而是日译本的重译。

25)松本健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日本人》，东京：朝日新闻社，1975年，第187页。

26)赵影深〈杜思退益夫斯基与新俄〉《小说月报》第22卷第11期1931月。

27)同注3。

28)李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4期。

29)〈《竖琴》前记〉，《鲁迅全集》4，第432—437页《参考书目李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研究月刊》2004年第4季春林·杜秀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卷第3期，1990年陈健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国苏俄文学研究史论》，重庆出版社，2007年王圣思〈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俄国文学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王圣思〈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2期丁世鑫〈「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中国的基本定位〉，《俄罗斯文艺》200期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卷，北京：东方出版社，200中島长文编目目》，东京，1986年下村作次郎〈关于〈奔原〉这个小杂志〉，《吡呀》第10期，1978年芦田肇〈初期茅盾的原理文学观的获得契机——关于其俄国文学的接受〉，《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01册，1986年本间久雄《欧现文艺思潮概论》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27年黑田辰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二文献〉，《书物》第2年第6册，1934年白井澄〈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之“市俗”观——以与高尔基之关系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1期松本健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日本人》，东京：朝日新闻社，197。Lu Xun and the reception of the Dostoevsk Literature in China in the 1920-30s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 with contemporar Japan and Europe. Shirai Sumiy (Baijing Chengshi Keyword Lu Xu, Dostoevsky, Japan, roletarian literatur In this article, I arranged the situation of the reception of the Dostoevsk Literature in the 1920-30s in China, especially in relation with contemporar Japan and Europe, and analyze the role that Lu Xu 鲁 carried out in it. n May Fourth Er, Dostoevsky was introduced as “humanistic write by leaders of Chines new literature. u Xun didt refer to

Dostoevsk's Literature carefully then, but he had a strong interest in it. "Poor People" which was the first book translated by Wei Cong (韦丛) in China was published by aid of Lu Xun. In the 1930s, various theories of Dostoevsk's Literature were brought into China, especially, Japanese various theories of it were flowed into China. Actually, in Japan, there were the decline of the Proletarian literature and a trend of the Renaissance in the background of Japanese Dostoevsk's fever. But in China, Chinese intellectual didn't "choose" the theories but receive the contemporary various theories at a time. In this situation, Lu Xun announced his original opinion for Dostoevsk's Literature as a Chinese reader. The word of Lu Xun had depth in opposite to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ostoevsk's fever.